

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

——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

李春玲

提要:教育扩张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但它能否使教育机会分配变得更加平等,这一直是引发论争的问题。1999-2002年期间,中国政府采取了大学扩招政策,导致大学生数量和高等教育机会成倍增长。关于这项政策的实施对高等教育机会平等化所产生的影响,目前的研究还未取得确定的结论。本文基于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一个次级数据集,采用logit模型分析了大学扩招对不同阶层、不同户口身份、不同民族和性别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影响,并同时检验MMI假设、EMI假设和理性选择理论在中国社会的有效性。本文的结论是:大学扩招没有减少阶层、民族和性别之间的教育机会差距,反而导致了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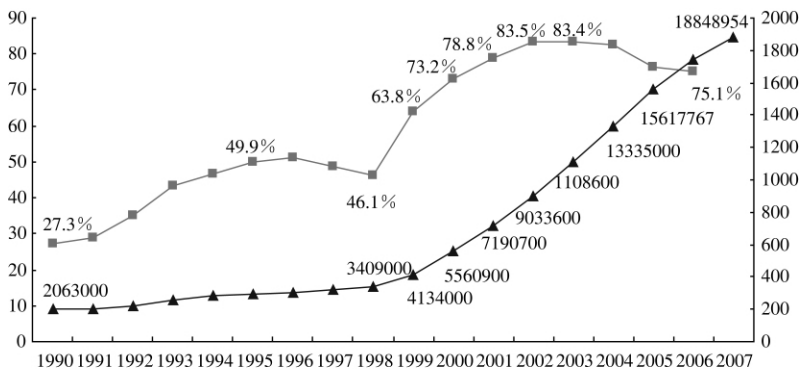
关键词:大学扩招 教育机会不平等 教育分层 城乡差距

一、研究背景:高校扩招与教育公平

2009年1月新华社播发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有关教育问题的署名文章,文中提到“有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农民收入逐步提高了,农村孩子上学的机会多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温家宝,2009)。此文的发布引发了社会公众对于城乡之间教育不平等问题的热议。几个月之后,在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前夕,多家媒体报导了2009年高考报名人数骤降,与2008年相比下降3.8%,实际减少约40万人(《人民日报》2009;《新京报》2009;《中国新闻网》2009)。许多高中应届毕业生放弃高考,其原因是由于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对于许多农村家庭、贫困家庭和较低阶层家庭的子女来说,高等教育昂贵的经济成本如果未能换来稳定的收入和就业,显然不值得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来争取。与此同时,人们还注意到的一个现象是,近年来,许多农村家庭、贫困家庭和较低阶层家庭出

身的孩子,在初中毕业甚至初中未毕业时就放弃升学机会,进入劳动力市场。与此对应的现象是,升入高中,尤其是升入重点高中的学生的家庭背景层次不断提升。^① 这一系列的现象似乎显示出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有可能在加剧。

上述现象与我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景象相矛盾。1999 年以来政府采取的大学扩招政策及其他相关措施,使高等教育规模急速扩大,高等教育机会迅速增长。图 1 展示了近 20 年中国高等教育机会的增长态势。1999 年以前,应届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的比例和在校大学生人数增长较为缓慢,但 1999 年大学扩招政策实施后,高等教育规模和高等教育机会快速增长,在随后的 5 年里,中国高校招生人数以年均 20% 的幅度增长。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的比例从 1998 年的 46.1% 猛



—■— 应届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的比例(%), —▲— 在校大学生人数(万人)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1-2008。

图 1 中国高等教育增长趋势(1990-2007)

增至 2003 年的 83.4%。2006 年以来,由于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突出,高校扩招幅度放缓,但仍维持约 5% 的增长幅度。虽然大学扩招政策的初衷是为了缓解就业压力,但人们也许会想当然地以为,大学扩招导致的高等教育机会的增长必然会降低教育机会不平等。当高等教育处于精英教育阶段(只有少数人有机会上大学)时,高等教育的机会通常

① 一项对高中生家庭背景的调查显示,某重点中学政府、企业、专业人员等优势阶层的子女,由 1978 年的占 44.7% 增加到 2008 年的 77.6%,增加了 33 个百分点;而工人、农民子弟的比例,则从 1978 年的占 42.4% 锐减至 2008 年的 5.9%,降低了 36.5 个百分点(“全国中小学教育现状调查研究”课题组 2009)。

由中上层阶级和优势地位群体垄断,当高等教育机会增加而使高等教育趋向于大众化时,较低社会阶层和弱势群体有可能争取到越来越多的高等教育机会,从而导致教育机会分配的平等化。中国高等教育在短短数年中急速扩张——当今世界可能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达到如此速度,按常理来说应该有利于推进教育公平。那么,大学扩招政策导致的高等教育扩张到底对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平等程度产生了何种影响?是降低了原有的不平等,还是维持了原有的不平等,或者,加剧了原有的不平等?这就是本文要解答的问题。

二、理论解释和实证研究:教育扩张与教育公平

教育机会在人口中的分配形态,极大程度地决定了社会分层的基本特征和社会不平等的程度。随着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在许多国家得到普及,更多的社会分层研究者聚焦于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以此来研究教育机会公平问题。因为在现代社会,大学文凭成为人们获得较好社会经济地位的前提条件。大量的相关研究(Shavit & Blossfeld,1993; Sieben & De Graaf,2003; Lucas,2001; Breen & Jonsson,2000,2005; Pfeffer,2008; Stocke,2007)证实,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受到家庭背景、民族和种族、性别等因素的影响,出身较低社会阶层的人、少数民族和种族以及女性在竞争高等教育机会方面处于劣势,从而导致了社会分层界线的强化和阶级地位的再生产。20世纪中期以来,许多国家采取了高等教育扩张的策略,提供更多的大学教育机会,同时在高校录取制度方面进行一些改革,希望以此减少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促进整个社会的公平水平。不过,一系列的比较研究(Shavit & Blossfeld,1993; Erikson & Jonsson,1996b; Jonsson & Erikson,2000; Shavit & Westerbeek,1998; Sieben et al.,2001; Breen & Jonsson,2005; Ballarino et al.,2008; Pfeffer,2008)发现,在有些国家,高等教育扩张期间,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平等化程度有所提高,但在另一些国家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还有少数国家在高等教育扩张期间教育不平等程度反而有所上升。针对这些相互矛盾的研究结果,学者们提出了各种理论来解释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平等之间的关系。

(一) 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MMI 假设)

有关教育扩张与教育不平等之间关系的最著名的一个理论假设是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简称 MMI 假设)。这一假设声称:教育扩张并不能导致教育机会分配的平等化,相反,只要上层阶级或优势地位群体还有可能去提高他们的教育机会,教育机会不平等就会维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教育扩张创造的新的教育机会通常被上层阶级的子女占据,他们拥有的经济、文化、社会 and 动机资源有利于他们抓住这些新产生的机会。只有当上层阶级在某一级别的教育中达到饱和——比如说 80% 以上的上层阶级子女都能上大学,这一级别的教育不平等才会下降(Raftery & Hout, 1993; Mare, 1981; Shavit & Blossfeld, 1993; Eriksson & Jonsson, 1996a; Breen & Goldthorpe, 1997; Breen & Yaish, 2006; Shavit et al. 2009)。这一假设最初由拉夫特瑞和豪特(Raftery & Hout, 1993)提出,并获得了夏维特和布劳费尔德(Shavit & Blossfeld, 1993)的多国比较研究结论的支持。夏维特和布劳费尔德对 13 个国家的经验数据进行比较分析的结果是:教育不平等是跨国家和跨时代的持续,教育扩张并未降低教育不平等程度。在被研究的 13 个国家和地区,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在教育扩张期间都未明显下降,只有瑞典明显例外,以及荷兰部分例外。

(二) 有效维持不平等假设(EMI 假设)

在 MMI 假设的基础上,卢卡斯(Lucas, 2001)进一步提出了 EMI 假设(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MMI 假设认为,当上层阶级在某一水平的教育中达到饱和,比如超过 80% 的上层阶级的子女都能获得高等教育,那时,教育扩张产生的新的教育机会才会向较低阶层扩散,从而导致高等教育不平等下降。卢卡斯对这一假设进行了修正。他认为,即使上层阶级在高等教育中达到了饱和,但不平等还将在高等教育中以更有效的方式维持。他提出,在教育机会分配方面存在着两种不平等,一种是数量上的不平等,比如上层阶级的子女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的可能性(比例)大于较低阶层的子女;另一种是质量上的不平等,即在同一级别的教育中存在着等级分层,同样是高等教育,但某些种类的高等教育的文凭具有更高的价值,而另一些种类的高等教育文凭价值较低。比如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大学本科文凭的含金量更高,

而大学专科文凭的含金量低于本科文凭。所谓质量上的不平等是指,上层阶级获取更高价值的大学教育的机会远多于下层阶级。卢卡斯的EMI假设声称,上层阶级在某一级别的教育(比如高等教育)中达到饱和,可能会使下层阶级获取这一级别教育的机会得到提升,从而这一级别的教育不平等似乎下降了(数量不平等下降了),但是,下层阶级争取到更多的教育机会主要体现在价值较低的教育种类(比如大学专科)而不是价值较高的教育种类(如大学本科),上层阶级仍然在含金量更高的教育种类中占据优势地位,从而教育不平等得以有效维持(质量不平等仍然维持)。EMI假设获得了部分实证研究结论的支持(Lucas, 2001; Ayalon & Shavit, 2004)。

(三) 个人教育决策的理性选择理论(RCT)

MMI假设虽然是这一研究领域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广泛被引用的理论点,但近10年来,这一理论解释不断受到争议,因为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教育扩张期间教育不平等程度下降。乔森等人的研究发现,瑞典、德国和法国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出现了下降趋势(Jonsson et al., 1996);布瑞恩等人有关欧洲8国的比较研究证明:8个国家中有6个国家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在20世纪的后半期显示了下降趋势(Breen et al., 2005);巴拉里诺等人对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研究证明,这两个国家的教育机会不平等也下降了(Ballarino et al., 2008);林德贝克的研究发现丹麦的教育机会不平等下降了(Lindbekk, 1998);德·格拉阿夫等人则发现荷兰的教育机会不平等也下降了(De Graaf & Ganzeboom, 1993; De Graaf et al., 2000)。这些研究发现促使研究者对相关的理论假设进行重新定位。近年来研究者关注的重点问题是,在教育扩张的背景之下,哪些因素导致了教育机会分配的平等化,哪些因素可能加剧教育不平等。换句话说,为什么在有些国家教育扩张期间教育机会不平等下降了,但在另一些国家教育扩张并未带来这样的结果?埃里克森等人对瑞典个案——它是夏维特和布劳费尔德(Shavit & Blossfeld, 1993)多国比较研究中最为例外的案例——的研究发现,高就业率,尤其是针对下层阶级的就业保障,是导致阶级之间教育机会不平等下降的主要原因(Erikson & Jonsson, 1996a, 1996b)。巴拉里诺等人的研究则发现,导致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教育机会不平等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就业保障增强和学校筛选作用弱化(Ballarino et al.,

2008)。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一些社会分层理论家根据贝克(Becker, 2003)的理性选择原理,提出了微观层面的教育决策理性行动模型,以支持教育不平等持续假设并解释为什么教育机会不平等会下降(Eriksson & Jonsson, 1996a; Breen & Goldthorpe, 1997; Breen & Yaish, 2006)。在这个模型里,决定一个人是否继续下一阶段的求学(E_{n+1})或者放弃继续求学而使教育水平停留在目前水平(E_n),取决于下述四个因素:下一阶段的教育水平(E_{n+1})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回报率(B);决定停留在目前教育水平(E_n)而可能导致的身份地位的下降总量(SD);获得下一阶段教育水平(E_{n+1})的成本(C);以及决定争取下一阶段教育水平但未能成功的概率大小(P_f)。从 E_{n+1} 收益越多,继续求学的动机越强;反之, E_{n+1} 的成本越高,获取 E_{n+1} 失败风险越大,继续求学的动力就越小。这一模型还假定,收益B和成本C对所有阶级来说都是一样的,但地位下降幅度SD和失败风险 P_f 对不同的阶级则含义不同。这是因为,身份地位下降是相对于其原有的地位(家庭出身),对于出身较低阶层的人来说,不继续求学而导致的地位下降会比较小,而对于出身中上层的人来说,不继续求学而导致的地位下降感受会比较强烈。至于失败风险 P_f 则依赖于原有的教育地位和状态。出身于优势地位家庭或上层阶级的人,更易于在求学过程中取得成功(失败的可能性较小),因为父母传递给他们的认知和技巧与教育体制的要求较为吻合。另外,如果他们求学失败,父母也能利用社会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来补偿损失。但是,对较低阶级来说,求学失败概率 P_f 远高于上层阶级,而且失败后可能导致的经济或其他方面的损失也更为严重。这一模型认为,多数情况下,教育扩张会导致教育成本下降和教育收益上升,但是,如果SD和 P_f 的阶级差异没有变化,那么教育不平等会持续;反之,如果SD和 P_f 发生了变化,比如,就业保障增强和学校筛选作用弱化(如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情况)导致失败风险 P_f 下降,那么阶级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就可能下降。这一套解释推论被称为理性选择理论(RCT)或理性选择模型(RCM)。

从本质上来说,理性选择模型和MMI假设及EMI假设都坚持相同的假定,即教育机会的阶级不平等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教育扩张本身也不会降低教育机会不平等。MMI假设和EMI假设所坚持的是,持续的教育机会的阶级不平等,是上层阶级控制了新产生的教育机

会并在教育领域实施社会排斥行动所导致的后果。而理性选择模型的关键性假设是,与特定教育水平相关的身分地位变化和投资获取某种教育水平的失败风险,对于不同阶级的人含义不同。如果这两方面的阶级差异没有随着时间推进而下降,那么教育机会的阶级不平等就不会下降。反之,如果采取某些社会政策而导致这些因素发生变化,那么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有可能下降。

(四) 国内相关研究结论

国内学者对于我国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已有大量研究。许多研究结果证实,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存在着阶层、城乡、民族和性别之间的不平等(谢作栩、王伟宜,2005,2006;谢作栩等,2008;谭敏、谢作栩,2009;安树芬,2002;文东茅,2005)。不过,对于大学扩招政策实施以后教育机会不平等变化趋势的专门分析并不多。由于这是一项近期实施的政策,在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领域,对此项政策的社会平等效应的系统考查也不多见。有一些小规模或局部区域的数据分析(如某几所大学的数据资料)显示,大学扩招缩小了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城乡差距和性别差距(杨旻,2009;原春琳,2007;徐平,2006),但另外一些研究则得出相反的结论,比如杨东平(2006)声称,大学扩招后阶层差距有所扩大。不过,上述这些研究所采用的数据资料有较大的局限性,数据分析方法也较为简单。刘精明(2006)采用2003年度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资料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做了较系统的考查,得出的结论是:大学扩招后高等教育机会的阶层差距大幅缩小。但此项调查数据存在着某些局限,不太适用于考查大学扩招后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情况,因而其结论还需进一步推敲。^①另一项值得关注的研究是哈佛大学的古毛灿(音译)采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追踪数据对1981-2006年期间中国教育不平等变化趋势的

^① 此文的作者未在其文章中列出数据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因而无法获知其数据和变量的较详细的信息,但从列出的信息来看,调查数据的样本规模较小(仅为5960),因获得高等教育的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较小,如此小的样本量用于比较分析不同年代的高等教育机会分布会存在一些问题。虽然作者声称,此调查数据中接受大学教育的人的比例超常地高(样本分布的代表性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未列出大学扩招政策实施后接受大学教育的个案数量。另外,此文作者采用的数据是2003年收集的调查数据,而当时绝大多数大学扩招后上大学的人还是在在校生,此调查数据的调查对象又排除了在校生,因此,笔者认为,此数据不太适用于分析大学扩招后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

考查(Guo 2008) ,这项研究得出的结论与刘精明的研究结果相反 ,古毛灿的数据分析显示 ,大学扩招后城乡和阶级之间的高等教育不平等都有很大幅度上升 ,城乡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上升了 33.6% ,而阶级之间的高等教育不平等则几乎翻了一倍 ,增长 96.7%。这些相互矛盾的研究结果使我们无从把握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真实情况和变化趋势 ,从而也无法客观评估大学扩招政策的社会平等化效果 ,当然也不能更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教育公平的政策建议。为此 ,很有必要在已有的研究结果和理论解释的基础之上 ,采用更可靠的数据资料和更为精细的统计分析方法 ,对大学扩招后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状况进行深入考查。

三、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

(一) 研究问题

本研究要讨论的问题是:1999年(实施大学扩招政策)以来的高等教育急剧扩张和高等教育机会迅猛增长对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平等化有何影响?是降低了教育机会不平等,还是维持了教育机会不平等,或者是加剧了教育机会不平等?本文所关注的教育机会不平等主要指四个方面的机会分配不平等:阶层之间、城乡(户口身份群体)之间、民族之间和性别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差异。不过,本文重点讨论的是阶层之间和城乡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因为这两种教育机会不平等是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最关键性的教育不平等。^①对于民族之间和性别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差异,本文只做初步考查。^②

本研究考查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变化的基本策略是:比较1999年

① 在当前中国社会,地区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也十分突出,不过,导致地区之间教育不平等的原因机制与阶层不平等和城乡不平等有所不同,需要进行专门研究和理论解释,本文在这里不进行讨论。

② 由于样本量的局限,少数民族接受大学教育的个案有限,当模型涉及太多变量和较细分类时,其回归系数的显著水平会受影响,从而有可能影响对民族差异的变化趋势进行准确估计。至于目前高等教育的性别差异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现象,一方面,严格的逐级升学考试制度,使女性获得了一些升学优势(相对于男性);但另一方面,某些特殊群体的女性上大学的机会远低于平均水平。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没有针对此问题进行更细致的数据分析。

之前(扩招政策实施之前)与1999年之后(扩招政策实施以来),不同阶层、户口身份群体、民族和性别的高等教育机会差异,观察其是否发生变化和发生何种变化,从而判断教育机会不平等是下降了、上升了还是没有变化;或者,在哪些方面教育机会不平等下降或上升了。

与此同时,本研究还想通过数据分析来验证上述三种理论假设——MMI假设、EMI假设和理性选择模型,检验这三种理论解释在中国社会的适用性。这三种理论解释都涉及到了导致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原因机制,而发现这些原因机制有助于我们寻求降低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政策方案,这也是本研究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如果大学扩招使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下降了,那么我们只需进一步扩张高等教育规模就能促进教育公平;但如果大学扩招后教育机会不平等没有下降,或者甚至上升了,那么我们就需要寻找其他对策来减少教育不平等。

(二) 西方的理论解释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

上述三种理论假设是本研究的理论探讨的出发点,但同时本研究更感兴趣的是中国社会的一些特殊性。MMI假设、EMI假设和理性选择模型主要是由西方主流社会分层理论家基于欧美国家的普遍经验提出的,近年来,研究者开始把这几种理论解释用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的分析(Shavit et al., 2009)。在考查大学扩招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影响和检验上述理论假设在中国社会的适用性时,我们需要注意中国社会的某些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

第一,西方发达社会的高等教育扩张通常是在阶级阶层结构相对稳定(或者阶级现象逐渐淡化)^①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中国社会在经历了大约20年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剧烈变迁之后,1999年大学扩招以来,社会阶层结构处于强化阶段,社会经济分化进一步加剧,阶层之间的差异进一步扩大(李春玲, 2005)。MMI假设、EMI假设和理性选择模型都是基于阶级结构和阶级差异持续稳定的前提条件,那么,在中国这样一个新的阶级阶层结构正在形成、阶级阶层差异正在扩大的社会中,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是否会出现某些特殊

^① 某些学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出现了阶级差异缩小或阶级消亡的趋势(Pakulski & Malcolm, 1996)。不过,多数社会分层理论家,尤其是MMI假设、EMI假设和理性选择理论的支持者则认为西方社会的阶级差异持续存在。

性呢?

第二,中国社会正处于制度变迁过程之中,即由原来的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教育体制的变迁也遵循着这一方向。教育体制市场化的后果之一是高等教育成本不断攀升。与此同时,教育的另一方向是筛选制度——逐级考试制度和学校等级分层(从全国到地方各级重点与非重点学校的分类)——的日益严格化。大学扩招以来,高等教育成本还在继续上升,教育筛选制度的严格化还在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情况相反,在西方发达社会,教育扩张往往伴随着教育成本的明显下降和筛选制度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

第三,中国高等教育扩张的主要动机与多数西方社会不同。欧美国家教育扩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教育机会分配的平等程度并促进整个社会的平等化,高等教育扩张政策往往是一套高等教育改革方案(包括其他一些促进教育平等化的政策)中的一部分。而中国政府采取大学扩招政策的直接的、也是主要的动机是以延长年轻人受教育时间来缓解就业压力,因而在扩招政策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并未考虑并且也未预期它会对教育不平等产生影响。这一政策出发点是否会影响教育扩张与教育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呢?

第四,大学扩招政策导致了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在短期内急速扩张,短短数年之内高等教育机会的供给量几乎翻了数倍,如此速度的扩张在其他社会极为少见。MMI假设、EMI假设和理性选择模型都认为,社会结构中存在着的阶级不平等导致了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即使教育机会供给量增加,教育机会不平等还会持续存在,因为新增加的教育机会更多地为中上阶级所获取。但是,如果教育机会供应量猛然间增加很多,阶级不平等对教育机会分配的影响是否会短暂失灵?

第五,近10年来中国劳动市场和就业结构具有某些与西方社会不同的特征。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大学扩招政策实施期间,经济的高速增长带动了制造业的迅猛扩张,蓝领工作岗位的数量增加很多,蓝领工人的工资水平增长明显,在某些地区和某些时期出现了蓝领工人短缺现象(比如“民工荒”)。而与此同时,由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白领工作岗位的增长速度较慢,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现象日益突出,大学毕业生的最初薪资水平有所下降。这些因素很显然会对个人的教育决策产生影响,使理性选择模型计算出不同的结果。

第六,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严重的城乡之间教育机会

不公平。在中国社会,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也许比阶级阶层之间的教育不平等更为突出。MMI 假设、EMI 假设和理性选择模型主要是针对阶级不平等的运作机制而提出的理论解释,那么城乡之间教育不平等的机制和运作规则与阶级不平等是类似的吗?

(三) 研究假设

根据前述已有研究所提出的理论假设,本文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一些相关假设来加以验证。

第一组研究假设是为了验证 MMI 假设。如果 MMI 假设是成立的(或者是适用于中国社会的)——高等教育扩张本身并不能导致教育不平等下降,除非优势地位群体达到教育饱和,那么我们应该获得的结论是:大学扩招并未导致(阶层之间、城乡之间、民族之间和性别之间)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下降,因为中上阶层和优势地位群体还未达到教育饱和。具体的假设是:

假设 1:与 1999 年之前相比,1999 年以后高等教育机会(阶层、城乡、民族和性别)不平等没有下降。

第二组假设是针对 EMI 假设。EMI 假设认为,高等教育不仅存在数量上的不平等(不同阶级和群体上大学的机率不同),而且存在质量上的不平等(上层阶级和优势地位群体有更多机会获得更有价值的大学文凭或进入更有名望的大学学习)。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大学本科文凭与大学专科文凭的价值含金量明显不同,大学本科文凭似乎意味着正牌的高等教育,而大学专科文凭则像是杂牌的高等教育,两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回报率也明显不同。如果 EMI 假设成立(或者是适用于中国社会),那么下面这个假设应该得到证实:

假设 2:大学本科教育机会的阶层、城乡、民族和性别差异大于大学专科教育机会。

EMI 假设的另一含义是,如果高等教育扩张使中上阶层和优势群体达到了教育饱和,那么有可能出现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下降,但这种机会不平等下降主要表现在较低价值的高等教育领域(大学专科)而不是较高价值的高等教育领域(大学本科)。中国目前的高等教育扩张还未达到中上阶层和优势地位群体的教育饱和,不过,在短时期内高等教育机会猛增(大学扩招的后果),是否有可能达到一种类似于中上阶层教育饱和的效果?就目前来看,至少社会上层人员(精英群体)已

达到了基本的教育饱和。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有可能出现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下降的迹象?如果有这种迹象的话,它应该表现在较低等级的高等教育领域(比如大学专科教育)而不是较高等级的高等教育领域,由此可以提出下面的假设:

假设3:在高等教育急速扩张并且优势地位群体或中上阶层在高等教育中逐渐接近于饱和时,教育机会不平等下降更可能表现在大学专科教育而不是大学本科教育。

最后,理性选择理论也为我们提供了可能的假设。根据理性选择模型,个人的教育决策(上不上大学)取决于四方面的因素:教育成本(C)、教育收益(B)、失败的风险(P_f)和地位提升(SD)。正如前面所介绍的,在大多数国家,教育扩张期间往往出现教育成本下降和教育收益上升,而教育机会不平等的下降或上升主要取决于失败风险的高低和地位提升程度。但在中国,1999年以来高等教育的急速扩张则伴随着高等教育成本(学费和生活费)不断攀升,而大学教育的短期收益(大学毕业生就业和大学毕业生最初薪资)则有所下降。这两个因素对于不同阶层的人或者城乡居民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教育成本上升和短期教育收益下降对中上阶层的人和城市居民的教育决策影响较小,但可能对中下阶层和农村居民的教育决策产生根本影响——使其中的部分人决定不上大学。与此同时,失败风险也在上升。对于中下阶层和农村居民来说,降低失败风险的最有效的途径是减少教育系统的等级分化程度和使筛选机制宽松化。然而,自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学校教育系统的分层化(全国重点学校、省重点学校、市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不断增强,考试筛选制度(中考和高考)越来越严格,其后果是增强了不同阶层和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李春玲,2003),因为农村孩子和中下阶层子女较难通过层层严格考试而进入大学。1999年以来,教育系统的分层化和筛选制度的严格程度还在继续发展,中下阶层成员和农村居民在进行教育决策时不能不考虑决策失败所带来的各种损失——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但未能考入大学,或者只获得较差学校的文凭而不能找到工作,以及因追求升学而放弃就业机会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分层正处于地位等级进一步分化(阶层地位差距拉大和阶层界线明晰化)的过程中,而教育水平对地位获得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大,这意味着,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而导致的地位提升程度(SD)在增加。对于中上阶层和优势地位群体来说,如果失去高

等教育机会则会使他们的地位丧失幅度很大,这促使中上阶层和优势地位群体有更强烈的愿望去追求高等教育机会,而中下阶层和弱势群体的这种追求高等教育的动力则没有那么强(根据理性选择理论的说法)。在上述这些条件发生如此变化的情况下,如果理性选择模型成立(或适用于中国社会)的话,那么,1999年实施大学扩招政策以来,贫困阶层、农村居民或弱势群体基于这一模型进行的理性计算所得出的结果很可能是越来越大的负数,即越来越倾向于放弃上大学,其结果是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上升。由此提出的具体的假设是:

假设4:1999年以后,阶层之间、城乡之间、民族之间和性别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差距有所上升。

四、数据、变量和方法

(一) 数据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是从国家统计局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筛选个案而形成的一个次级数据集。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是以个体为样本个案,但保留了家庭户信息,作者依据数据中的家庭序列代码、样本与户主关系等信息,进行父代—子代匹配,并抽选出1975—1985年出生的子代样本19615个。需要注意的是,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并非所有的1975—1985年出身的人都提供了父辈信息,有部分样本的父辈信息缺失(如果他们没有与父母住在一起)。作者所生成的数据排除了父辈信息缺失的样本,即没有与父母住在一起的人。这一因素可能影响样本分布。为了判断此数据的代表性,作者比较了四种不同数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及其筛选、中国人民大学的2006年CGSS数据和中國社科院的2006年CGSS数据)的相关变量的频数分布。^①

从四种数据的比较来看,本文采用的筛选数据在性别、教育水平、户口、民族及家庭背景的样本分布情况具有较好的代表性。首先在教育程度的分布上,筛选数据与原数据较为接近,只是高中以上学历的人所占比例略高:筛选数据的高中学历比例是18.9%,而原数据是

^① 因篇幅所限,比较四种数据的表格省略。

17.2% ;筛选数据的大专学历比例是 11.4% ,而原数据是 8.3% ;筛选数据的大学本科学历比例是 7.3% ,而原数据是 4.5% 。另外 ,从筛选数据的两个年龄组的比较来看 ,1980 - 1985 年出生组的教育水平明显高于 1975 - 1979 年出生组 ,这与教育扩张趋势相一致 ,而且教育水平增长幅度与原数据较为吻合。中国人民大学的 CGSS 抽样调查数据中的较高学历者的比例严重偏高 ,其高中学历、大专学历和大学本科学历的比例分别为 26.4%、15.7% 和 11.3% ,远远高于 200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国社科院 CGSS 抽样调查数据的教育程度分布与筛选数据极为接近 ,但是 1980 - 1985 年出生组的教育水平明显低于 1975 - 1979 年出生组 ,这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在家庭背景方面 ,200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没有相关变量 ,筛选数据不能与原数据进行比较 ,只能与两个 CGSS 数据进行比较。筛选数据的父亲职业分布与中国人民大学的 CGSS 抽样调查数据较为一致 ,但与中国社科院的 CGSS 抽样调查数据有些差异——此数据父亲职业为农民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两个数据 ,并且工人比例明显低于其他两个数据。在父亲户口身份的分布上 ,筛选数据与中国社科院的 CGSS 抽样调查数据较一致 ,但与中国人民大学的 CGSS 抽样调查数据有些差距——此数据的父亲非农户口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两个数据。我们无从判断两个 CGSS 数据中哪一个的分布更接近于真实情况 ,但总体而言 ,筛选数据与两个 CGSS 数据所反映出的家庭背景分层形态基本相似。另外 ,从筛选数据的两个年龄组的比较来看 ,1975 - 1979 年出生组与 1980 - 1985 年出生组的家庭背景分布形态比较一致 ,^①只是 1980 - 1985 年出生组的父亲中农民比例低于 1975 - 1979 年出生组 ,并且工人比例高于 1975 - 1979 年出生组 ,同时 1980 - 1985 年出生组的父亲中非农户口比例高于 1975 - 1979 年出生组 ,这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筛选数据的少数民族比例与原数据基本相同。在性别分布上 ,原数据的男性比例低于女性比例 ,这与人口的真实性别分布不符 ,两个 CGSS 数据的男性比例也偏低。筛选数据的男性比例则偏高 ,达到了 63.5% ,^②这也与真实情况不符。为了解决性别分布的样本偏误 ,作者

① 如果筛选数据由于缺失值的原因而出现家庭背景分布的系数误差 ,而两个年龄组的系统误差较为类似 ,这对年代变化趋势的判断影响不会太大。

② 可能是由于男性更可能与父母居住在一起 ,因而筛选数据中的男性样本较多。

根据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中 1975 - 1985 年出生的人口性别比例对筛选数据进行加权, 加权后的男性比例为 51.5%。

作者在使用该数据时, 最担忧的一个导致样本偏误的因素是, 1999 年之后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在 2005 年时有一部分是在校生(他们可能是集体户口), 因而调查数据未能提供其父亲信息。为此, 作者初步分析了 200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 1980 - 1985 年出生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是在大学扩招期间)的家庭户分布情况。这一年龄组人群中, 家庭户占 87.7%, 集体户占 12.3%; 同时, 86.6% 的人与父母住在一起(或有父母信息)。在 1980 - 1985 年出生并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中, 家庭户占 73.3%, 集体户占 26.7%; 同时, 71.8% 的人与父母住在一起(或有父母信息)。从上述分布情况来看, 在校因素对该数据的代表性有一定影响, 但仍可以基于此数据来做分析。

(二) 方法

在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分析中, 传统的分析模式是采用线性回归模型, 以被调查者的受教育年限为因变量, 以影响教育机会分配的各种因素(如家庭背景、性别或民族等)为自变量, 并区分年龄组(birth cohort)分别做回归分析, 通过比较各年龄组回归模型的回归系数的变化, 判断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参见李春玲, 2003, 2005)。但这一分析模式用于分析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时遇到了问题, 由于不同年代教育机会总量(由于教育扩张)在不断增长, 即边际分布在不断变化, 比较不同年龄组的回归系数所做的判断可能会产生误导。20 世纪 80 年代梅尔(Mare, 1980, 1981)设计了教育过渡模型(a model of educational transitions), 采用一系列的 logit 模型(以是否升学为因变量)考查从小学至大学的各阶段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分布。基于梅尔的分析思路, 后来的研究者(Smith & Cheung, 1986; Shavit & Kraus, 1990)大多采用包含年龄组变量的 logit 模型, 分析教育扩张期间教育机会不平等变化情况。这一模型以是否上大学为因变量, 把年龄组作为控制变量, 并通过年龄组与各自变量的交互效应来考查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年代变化。本研究也采用这一模型估计大学扩招前后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这一模型的公式为:

$$\log\left(\frac{P_i}{1 - P_i}\right) = b + \sum_k b_k X_{ki} + \sum_c g_c C_{ci} + \sum_{ck} d_c C X_{ci}$$

上述公式中 P_i 是指第 i 个人上大学的概率。 X_{ki} 代表了所有的自变量(影响上大学概率的各种因素) b_k 则是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反映了各自变量对上大学概率的影响程度。本研究要考查的影响因素是家庭阶层位置(父亲的职业)、家庭文化背景(父亲的受教育年限)、家庭经济背景(父亲月收入)、家庭户口身份(父亲的户口)、民族和性别。 C_{ci} 是年龄组虚拟变量,它在模型中作为控制变量(即控制了不同年代教育机会增长的效应) g_c 则是年龄组的回归系数,它反映了不同年代教育机会增长幅度。 CX_{ci} 代表了所有的年龄组与各自变量的交互项, d_c 是这些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它反映了各个自变量的效应的年代变化,即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情况。

(三) 变量

1. 因变量

本研究采用了两组 logit 模型,第一组模型(模型 1、模型 2 和模型 3)的因变量为“是否接受了高等教育”,是 = 1,否 = 0。这里的高等教育包括了大学本科教育和大学专科教育,已进入大学学习但还未完成学业的在校生也被归类为接受了高等教育。第二组模型(模型 4 和模型 5)分别分析大学本科教育机会和大学专科教育机会,模型 4 的因变量为“是否接受了大学本科教育”,模型 5 的因变量为“是否接受了大学专科教育”。

2. 年龄组

本研究的目的是考查 1999 年大学扩招之前与之后的阶层、城乡、民族和性别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是否发生变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作者把 1975 - 1985 年出生的人区分为两个年龄组,一个年龄组是 1975 - 1979 年出生的人,如果这个年龄组当中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那么他们大多是在 1999 年扩招之前进入大学;另一个年龄组是 1980 - 1985 年出生的人,他们当中如果有人接受了高等教育,应该是在大学扩招期间或之后进入大学。^① 年龄组分类形成了一个年龄组虚拟变量,1975 - 1979 年出生年龄组 = 0,1980 - 1985 年出生年龄组 = 1。年龄组虚拟变量在模型中作为控制变量。

^① 由于 1% 人口抽查调查数据未提供被调查者上大学的时间信息,我们只能通过其出生年代来大致估计他们上大学的时间。

3. 自变量

本研究用以测量阶层之间教育机会不平等的自变量包括父亲职业(家庭的阶层位置)、父亲受教育年限(家庭的文化资本)、父亲月收入(家庭的经济资本)。父亲职业共6个分类,生成5个虚拟变量(农民=0)。父亲受教育年限为连续变量。父亲月收入的数据信息精准度较低,而且被调查者报告的月收入数值普遍较低,因而这一信息被简化成一个虚拟变量,月收入高于2000元=1,低于2000元=0。^①用以测量城乡之间教育机会不平等的自变量是父亲的户口身份,非农户口=1,农业户口=0。父亲的户口身份可以大致确定被调查者出生和生长于农村还是城市。测量性别不平等的性别虚拟变量设定为:男=1,女=0。测量民族之间教育不平等的变量也是一个虚拟变量,汉族=0,少数民族=1。

各个自变量及年龄组的描述性统计列于表1。

表1 分析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19615)

	合计	出生年龄群体	
		1975-1979	1980-1985
性别(男性,%)	51.5	50.2	51.8
少数民族(%)	10.1	10.4	10.0
本人受教育程度(%)			
大专	11.4	10.1	11.8
大本	7.3	5.9	7.7
研究生及以上	.3	.8	.3
父亲职业(%)			
管理人员	3.3	3.1	3.3
专业技术人员	6.7	7.0	6.7
办事人员	7.0	7.8	6.8
商业服务业人员	10.9	9.8	11.1
农民	51.1	55.3	50.2
工人	21.0	17.1	21.9
父亲户口(非农户口,%)	32.2	31.7	32.4
父亲月收入(≥2000元)(%)	4.0	4.3	3.9
父亲受教育年限(年,均值和标准差)	7.29(2.80)	6.93(3.00)	7.38(2.74)

① 由于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月收入信息的质量不高,离散程度极小,作为连续变量加入模型后其回归系数都不显著,因此,作者把这一变量转换为二分类变量(虚拟变量)。设定2000元作为高收入的临界点是基于此数据的收入分布形态,数据样本中仅有4%的人收入高于2000元。

4. 交互变量

模型共包括 10 个交互变量,即所有的自变量分别乘以年龄组,详细信息参见表 2。

五、数据分析结果

(一) 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总体状况

表 2 所列数据是以“是否接受了高等教育”为因变量的 logit 模型分析结果。模型 1 包括了父亲职业、父亲受教育年限、父亲月收入、父亲的户口身份以及本人的性别和民族等自变量,但未考虑年代变化。模型 1 的所有回归系数都是显著的,这表明,如果不考虑年代变化因素,父亲职业、父亲受教育年限、父亲月收入以及本人的性别和民族身份都对 1975 - 1985 年出生的人的高等教育机会产生了影响。

1. 阶层差异:父亲的职业地位、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影响

数据显示,阶层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十分明显,父亲的职业地位越高、父亲的文化水平越高、父亲的收入越高,本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就越大。管理人员的子女上大学的机会是农民子女的 5.1 倍,专业人员的子女上大学的机会是农民子女的 3.3 倍,^①办事人员的子女上大学机会是农民子女的 5.5 倍,商业服务业员工的子女上大学的机会是农民子女的 3.7 倍,产业工人的子女上大学的机会是农民子女的 3.5 倍。父亲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1 年,其子女上大学的机会即提高 26%。父亲是中高收入者,其子女上大学的机会是低收入者的 2.6 倍。

2. 城乡差异:父亲户口身份的影响

城市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远远高于农村人。城市人(父亲户口为非农户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农村人(父亲户口为农业户口)的 6.3 倍。

3. 民族和性别差异

少数民族上大学的机会明显少于汉族,少数民族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只是汉族人的 58%。性别之间也存在高等教育机会的差异。性

^① 由于专业人员群体中包括了许多农村地区的专业人员,所以专业人员子女上大学机会低于办事人员而接近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产业工人,后三个群体的成员大多居住于城镇。

表 2 大学扩招前后比较:出身背景因素对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 (Logistic Model)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B	Exp (B)	S. E.	B	Exp (B)	S. E.	B	Exp (B)	S. E.
父亲职业 (参照组: 农民)									
管理人员	1.620**	5.051	.124	1.617**	5.037	.124	1.927**	6.869	.293
专业人员	1.192**	3.295	.103	1.194**	3.299	.104	1.301**	3.672	.239
办事人员	1.703**	5.489	.100	1.706**	5.506	.100	1.845**	6.331	.232
商业服务业员工	1.307**	3.695	.091	1.300**	3.671	.091	1.375**	3.956	.215
产业工人	1.238**	3.448	.083	1.225**	3.404	.083	1.168**	3.216	.202
父亲受教育年限	.227**	1.255	.012	.225**	1.252	.012	.254**	1.289	.026
父亲月收入 (中高收入)	.937**	2.552	.096	.943**	2.568	.096	1.092**	2.980	.220
父亲户口身份 (非农户口)	1.846**	6.335	.062	1.858**	6.413	.062	1.217**	3.379	.156
性别 (男性)	-.361**	.697	.062	-.369**	.691	.047	-.317**	.728	.114
民族 (少数民族)	-.519**	.595	.107	-.517**	.596	.107	-.348	.706	.244
年龄组 (1980-85 年出生)				.265**	1.303	.062	.100	1.105	.263
年龄组 × 管理人员							-.343	.710	.323

续表 2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B	Exp (B)	S.E.	B	Exp (B)	S.E.	B	Exp (B)	S.E.
年龄组 × 专业人员							-.115	.891	.266
年龄组 × 办事人员							-.149	.861	.257
年龄组 × 商业服务业员工							-.070	.933	.237
年龄组 × 产业工人							.082	1.085	.222
年龄组 × 父亲受教育年限							-.033	.967	.029
年龄组 × 父亲月收入							-.181	.835	.245
年龄组 × 父亲户口							.748 **	2.113	.170
年龄组 × 性别							-.067	.935	.125
年龄组 × 民族							-.203	.817	.272
Intercept	-5.096	.006	.108	-5.303	.005	.119	-5.168 **	.006	.233
-2 log likelihood	11982.946	11964.649	11935.616						
df	10	11	21						
N	19615	19615	19615						

*: $P \leq 0.05$; **: $P \leq 0.01$; 因变量为“是否接受了高等教育”, 是 = 1; 否 = 0。

别的回归系数是负值,这意味着,女性上大学的机率高于男性,在同等条件下——相同的家庭背景和民族身份,男性上大学的机会只有女性的70%。这一结果似乎与人们的普遍印象相矛盾。一般而言,人们觉得男性上大学的可能性更大,不过,由于日益严格的考试制度和女生在考分方面的优势,男性可能正在失去以往所拥有的教育优势地位。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1975-1985年出生的男性和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十分接近,从绝对比例来看,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差异并不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性别不平等,更为细致的数据分析显示,女性的教育机会更可能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出生于较高社会阶层家庭和城市地区的女性上大学的机会高于同等条件的男性,而出生于较低社会阶层家庭和农村地区的女性上大学的机会则低于同等条件的男性。^①

(二) 大学扩招后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

模型2包括了模型1的所有自变量,并加入了年代变化(年龄组)控制变量。模型2的所有回归系数也都是显著的,这表明,在控制了不同年代教育机会供应量的变化情况下,父亲职业、父亲受教育年限、父亲月收入以及本人的性别和民族身份仍然对人们的高等教育机会产生影响。同时,年龄组回归系数显示,大学扩招后人们的高等教育机会明显增长,1980-1985年出生的人的高等教育机会是1975-1979年出生的人的1.3倍,即增长30%。

模型3的自变量增加了年龄组与各个自变量的交互项,这些交互项反映出各个自变量的影响作用在大学扩招后发生了什么变化。除了“年龄组×父亲户口”这一项回归系数是显著的以外,其他所有的交互项都是不显著的。其含义是,父亲职业、父亲受教育年限、父亲月收入以及本人的性别和民族等因素对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力在大学扩招前后没有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大学扩招并未导致高等教育机会的阶层差异、性别差异和民族差异的上升或下降。只有城乡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发生了变化,“年龄组×父亲户口”回归系数是显著的而且是正数。这表明,大学扩招后,高等教育机会的城乡差距进一步加剧,在原有城乡差距的倍数基础上,城市人与农村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1975-1979

^① 由于论文篇幅所限,有关性别之间高等教育机会差异的数据分析未能列入文中。

年出生的人当中,城市人上大学的机会是农村人的 3.4 倍,而 1980 - 1985 年出生的人当中,城市人上大学的机会是农村人的 5.5 倍(3.4 加上 2.1)。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模型 3 的民族这一项的回归系数变得不显著了,这可能是由于样本数量的因素影响了显著水平,而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机会的民族差异消失了。

(三) 大学本科与大学专科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比较

根据 EMI 假设,高等教育内部存在等级分层,越高等级的教育中的机会不平等的程度越大,在教育扩张期间,如果教育机会不平等出现了下降趋势,它更可能表现在较低等级的教育领域而不是更高等级的教育领域。大学本科与大学专科虽然都属于高等教育,但其文凭的价值含量不同,因而这两类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程度也会不同。表 3 列出了两个 logit 模型的分析结果。模型 4 考查大学本科教育机会的阶层差异、城乡差异、民族差异和性别差异,其因变量是“是否接受了大学本科教育”;模型 5 考查大学专科教育机会的阶层差异、城乡差异、民族差异和性别差异,其因变量是“是否接受了大学专科教育”(排除接受了大学本科教育的样本)。两个模型的回归系数见表 3。

1. 大学本科教育中由父亲职业地位差异(家庭阶层地位)所导致的机会不平等明显大于大学专科教育

模型 4 中父亲职业各项回归系数都大于模型 5 的相应系数。比如,管理人员的子女接受大学本科教育的机会是农民子女的 9 倍,而接受大学专科教育的机会为 5.4 倍;专业人员的子女接受大学本科教育的机会是农民子女的 5.6 倍,而接受大学专科教育的机会为 3.3 倍;办事人员的子女接受大学本科教育的机会是农民子女的 8.1 倍,而接受大学专科教育的机会为 5.1 倍;商业服务业员工的子女接受大学本科教育的机会是农民子女的 5.8 倍,而接受大学专科教育的机会为 3.4 倍;产业工人的子女接受大学本科教育的机会是农民子女的 4.1 倍,而接受大学专科教育的机会为 3.1 倍。大学扩招之后,父亲职业地位的影响作用在大学本科教育和大学专科教育中都没有发生变化(模型 4 和模型 5 中父亲职业与年龄组交互项回归系数都是不显著的)。

2. 父亲受教育年限(家庭文化资本)对大学本科和大学专科教育机会都有影响,但其影响程度相差不大

父亲受教育年限对大学本科和大学专科教育机会的影响程度相差

表 3 大学扩招前后比较:出身背景因素对大学本科教育机会
和大学专科教育机会的影响 (Logistic Model)

自变量	因变量	模型 4			模型 5		
		是否接受大学本科教育			是否接受大学专科教育		
		B	Exp(B)	S. E.	B	Exp(B)	S. E.
父亲职业(参照组:农民)							
管理人员	2. 202 **	9. 039	. 442	1. 693 **	5. 437	. 339	
专业人员	1. 727 **	5. 623	. 415	1. 201 **	3. 324	. 274	
办事人员	2. 086 **	8. 051	. 407	1. 619 **	5. 050	. 267	
商业服务业员工	1. 751 **	5. 763	. 401	1. 212 **	3. 359	. 248	
产业工人	1. 398 **	4. 047	. 392	1. 129 **	3. 092	. 229	
父亲受教育年限	. 204 **	1. 226	. 032	. 237 **	1. 268	. 029	
父亲月收入(中高收入)	. 589 **	1. 803	. 212	1. 027 **	2. 793	. 247	
父亲户口身份(非农户口)	1. 290 **	3. 634	. 272	1. 102 **	3. 009	. 181	
性别(男性)	-. 391 **	. 676	. 156	-. 213 *	. 808	. 131	
民族(少数民族)	. 205	1. 227	. 304	-. 646	. 524	. 138	
年龄组(1980-85年出生)	-. 381	. 683	. 437	. 248	1. 282	. 298	
年龄组×管理人员	-. 463	. 630	. 495	-. 285	. 752	. 373	
年龄组×专业人员	-. 348	. 706	. 466	. 069	. 933	. 302	
年龄组×办事人员	-. 176	. 838	. 455	-. 137	. 827	. 296	
年龄组×商业服务业员工	-. 369	. 764	. 449	. 034	1. 034	. 272	
年龄组×产业工人	. 042	1. 043	. 438	. 068	1. 070	. 250	
年龄组×父亲受教育年限	-. 003	. 997	. 036	-. 041	. 959	. 033	
年龄组×父亲月收入	. 171	1. 187	. 236	-. 244	. 784	. 276	
年龄组×父亲户口	. 981 **	2. 666	. 302	. 615 **	1. 850	. 196	
年龄组×性别	. 038	1. 038	. 170	-. 123	. 884	. 143	
年龄组×民族	-. 650	. 522	. 350	. 137	1. 147	. 346	
Intercept	-6. 458 **	. 002	. 383	-5. 298 **	. 005	. 265	
-2 log likelihood	7214. 133	9519. 633					
df	21	21					
N	19615	18229					

* : $P \leq 0. 05$; ** : $P \leq 0. 01$

不大,表现为模型 4 和模型 5 的父亲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较为接近。同时,大学扩招后,父亲受教育年限的影响作用在大学本科教育和大学专科教育中都没有发生变化,表现在模型 4 与模型 5 中父亲受教育年限与年龄组交互项回归系数都是不显著的。

3. 父亲月收入(家庭经济资本)对大学本科和大学专科教育机会都有影响,但对大学专科教育机会的影响更大

比如,大学本科教育中,父亲月收入高于 2000 元的人的教育机会是父亲月收入低于 2000 元的 1.8 倍,而在大学专科教育中,父亲月收入高于 2000 元的人的教育机会是父亲月收入低于 2000 元的 2.8 倍。为什么家庭经济资本对大学专科教育机会的影响大于大学本科教育?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大学本科教育的选拔更多地依据能力选择(比如高考分数)而不是家庭经济条件,而大学专科教育机会则较有可能通过多付学费而获取。能力培养较易于受到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阶层地位的影响,来自于中上阶层家庭的孩子和父母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更可能在一系列的考试中取得成功而进入大学本科教育。而与此同时,一些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他们原来的身份可能是工人和农民)因缺乏文化资本而不能使他们的子女顺利通过各种考试,他们通常利用经济资本来帮助其子女获取高等教育机会,而这一策略更易于在大学专科教育机会的竞争中发挥作用。大学扩招之后,父亲月收入的影响作用不论在大学本科教育还是大学专科教育中都没有发生变化(模型 4 和模型 5 中父亲月收入与年龄组交互项回归系数都是不显著的)。

4. 父亲户口身份对大学本科和大学专科教育机会都有影响,同时对大学本科教育机会的影响略大于对在大学专科教育的影响

比如,父亲户口为非农户口的人获得大学本科教育的机会是父亲户口为农业户口的人的 3.6 倍,而获得大学专科教育的机会则为 3 倍。大学扩招后,不论在大学本科教育还是大学专科教育中,父亲户口身份的影响作用都明显增强(模型 4 和模型 5 中父亲户口身份与年龄组交互项回归系数都是显著的),而且这种作用的增强在大学本科教育中更加突出。回归系数显示,大学扩招后,城市人接受大学本科教育的机会是农村人的 6.3 倍(3.6 加上 2.7),而接受大学专科教育的机会则为 4.9 倍(3 加上 1.9)。这表明,大学本科教育机会的城乡差距大于大学专科教育,并且,在大学扩招后,大学本科教育机会的城乡差距的扩大程度大于大学专科教育。

5.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大学本科教育和大学专科教育中女性都显示了优势

这一优势表现在模型 4 和模型 5 的性别回归系数都是显著的并且是负数。另外,大学扩招后,性别差异在大学本科教育和大学专科教育中都没有发生变化(模型 4 和模型 5 中性别与年龄组交互项回归系数都是不显著的)。

6. 模型 4 和模型 5 中的民族回归系数都不显著

这可能是由于样本太少所致。

综合上述数据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确定,大学本科教育中的机会不平等大于大学专科教育,尤其表现在阶层不平等和城乡不平等方面。不过,家庭经济资本的作用例外,它对大学专科教育机会的影响大于对大学本科教育机会的影响。另外,不论是大学本科教育还是大学专科教育,大学扩招并未使两者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水平下降,相反,城乡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在本科和专科教育中明显增强。

六、结论与讨论

(一) 假设检验结果

将数据分析结果与前面提出的假设相对照,我们得出下述结论:

MMI 假设(假设 1)得到证实。大学扩招并未使高等教育机会的阶层不平等、城乡不平等和民族不平等下降,即使大学扩招使高等教育机会在短期内高速增长,其促进平等化的效应也没有显现。

EMI 假设(假设 2)得到证实。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等级分层与教育机会不平等有交叉作用,较高等级的高等教育领域(如大学本科教育)的机会不平等大于较低等级的高等教育领域(如大学专科教育),尤其表现在阶层不平等和城乡不平等方面。

由 EMI 假设引申出的另一个假设(假设 3)没有得到证实。尽管大学扩招政策使高等教育机会供给量在很短时期内猛然增长,但它还是未能促成阶层、城乡和民族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下降,即使在较低等级的高等教育领域(大学专科教育)中,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也没有下降。数据分析结果对假设 3 的否定,实际上是进一步支持了 MMI 假设和 EMI 假设,即无论多么快速的教育扩张,只要上层阶层

和优势地位群体未达到教育饱和,教育机会不平等就不会下降,除非有其他的条件变化(如 RCT 假设所涉及的那些因素)。同时,数据分析结果也表明,大学扩招不仅没能减少较高等级的高等教育(大学本科)机会的不平等,而且也没有减少较低等级的高等教育(大学专科)机会的不平等。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数量不平等没有下降,而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质量不平等更不可能下降。

假设 4(RCT 假设)得到部分证实。大学扩招期间和之后,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不仅没有下降,而且某些方面(城乡差距)的不平等程度还有明显上升,这间接支持了理性选择理论。根据理性选择理论的说法,教育扩张本身并不能导致教育机会不平等下降,在教育扩张期间,教育不平等程度下降还是上升取决于教育成本(C)、教育收益(B)、失败的风险(P_f)和地位提升(SD),因为这四个因素决定了人们的教育决策。教育成本下降、教育收益上升和失败风险下降可以有效地提高中下阶层和弱势群体追求高等教育的愿望,从而有可能缩小教育机会不平等。大学扩招以来,中国社会在上述四个因素的变化方面似乎都不太有利于中下阶层和弱势群体追求高等教育,相反,日益高涨的教育成本、不断缩减的短期教育收益以及失败风险和代价的增长,都有可能促使中下阶层和弱势群体放弃上大学的机会,从而导致原来的教育机会不平等进一步加深。

(二) 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理论含义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正如前面所介绍的,本研究所检验的理论假设——MMI 假设、EMI 假设和教育决策的理性选择理论——都是目前国际社会学界讨论教育扩张与教育不平等关系时所关注的主要理论问题或理论解释思路。作者在检验这些理论假设的同时希望能发现中国社会的一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有可能进一步丰富或修正已有的理论解释。数据分析结果的确显示了一些特殊发现,但其背后的理论含义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

首先,MMI 假设的推论逻辑是,如果社会结构中的阶级不平等没有发生变化,教育机会分配的阶级不平等就会维持,而不论是否进行教育扩张(除非其扩张程度使上层阶级达到教育饱和)。中国社会正处于阶级阶层不平等扩大的时期,依照 MMI 假设的推论逻辑,教育机会的阶级阶层不平等也应该扩大。另外,依照理性选择模型推论,当阶级阶层之间差距拉大时,模型中的 SD (因接受高等教育而获得的地位提

升或因没有高等教育而导致的地位下降)的阶级阶层差异也会拉大,从而阶级阶层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就会上升。但是,高等教育机会的阶级阶层不平等在大学扩招后并没有上升,这可能由于大学扩招(高等教育机会供应量的快速增长)阻止了不断扩大的阶级阶层不平等向教育领域延伸。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大学扩招政策,可能高等教育领域的阶级阶层不平等会提升。要证实这一猜想,需要时期更长的数据和区分更细的年龄组群体进行比较分析,这是作者下一步的研究。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在一个阶级结构处于变迁时期的社会中,MMI假设的陈述应该不同于阶级结构相对稳定的社会。

其次,数据分析结果也对EMI假设提供了一些特别的解释。依照EMI假设,高等教育领域存在着质量不平等——更有价值、更有声望的高等教育领域(比如大学本科)中的阶级不平等大于较低价值和声望的高等教育领域(比如大学专科)。数据分析结果的确显示,来自中上阶层家庭和拥有较多家庭文化资本的人接受大学本科教育的机会,要远远多于下层阶级的人和拥有较少家庭文化资本的人,而这种不平等在大学专科教育中表现的程度要略轻一些。但与EMI假设相矛盾的是,家庭经济背景对大学专科教育机会的影响大于对大学本科教育机会的影响,这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处于社会转型和阶层结构变迁时期——给中国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带来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一个社会分层体系较稳定的社会,拥有较多经济资本的家庭通常也拥有较多的文化资本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其子女往往在竞争最有价值的高等教育机会方面居有优势。但在社会阶层结构变迁过程中的中国社会,一些新产生的、地位正在上升的社会群体——比如农民企业家和个体工商户,虽然拥有较多的经济资本但往往缺少文化资本(他们本身未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以前的社会地位也比较低,这些人的子女在竞争最有价值的高等教育机会时并没有优势,但他们可以通过金钱来为子女争取较低等级的高等教育机会。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家庭实现了代际的教育上升流动。EMI假设的另一个内容是,当教育扩张使上层阶级趋向于达到教育饱和时,下层阶级获得较低价值的高等教育的机会会增加,但较高价值的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还将持续。但是在处于阶层结构变动时期的中国社会,如果上层阶层趋向于达到教育饱和,那么新上升的阶层(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等)将比下层民众更先分享教育扩张的益处,也就是说,首先是新上升的阶层群体缩小

他们与上层阶层之间的教育差距,然后才是下层民众缩小他们与上层阶层之间的教育不平等。这一看法也需要进一步的数据论证。

再次,理性选择模型认为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取决于影响个人教育决策的四个因素——教育成本(C)、教育收益(B)、失败的风险(P_f)和地位提升(SD)。大学扩招以来,这四个因素的变化都不利于降低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相反还可能导致不平等程度的上升。不过,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并非各个方面的教育机会不平等都上升了,大学扩招以来,阶层之间和民族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只有城乡之间的不平等进一步拉大。为什么会有如此结果?为什么上述四个因素的变化只对城乡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产生影响,而没有对阶层和民族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产生明显影响?这是否意味着,由于中国社会的城乡差距问题突出,因而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是最核心的教育不平等?教育决策的理性选择理论所提及的四个因素最可能对农村居民的教育决策产生明显影响?另外,在其他国家,人们讨论教育不平等问题,通常关注的重点是阶级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在有些国家(比如美国或南非)种族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非常突出。不过,种族之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原因机制往往与阶级不平等的运作机制类似,因为种族之间存在明显的阶级分化。MMI假设、EMI假设和理性选择模型都是针对阶级不平等现象而提出的理论解释。在中国社会,最突出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是城乡之间的不平等,教育机会的城乡不平等的运作机制也许会与阶级不平等有所不同。这方面的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和检验分析,尤其是理性选择模型中的四个因素是如何具体地影响农村居民的教育决策,以及为什么没有对其他相对弱勢的群体产生影响。

最后,对于性别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差异,中国社会也有其特殊性——性别不平等与城乡不平等存在交叉作用。大量的研究显示,女性是教育扩张的最大受益群体(安树芬 2002;杨旻 2009;等),近几十年来中国教育的迅速发展,使女性的平均受教育机会日益接近于男性。本文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相同家庭背景情况下,女性上大学的机会还高于男性。但是,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差异在城市和农村的表现形式非常不同,城市女性的高等教育机会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而农村女性的高等教育机会似乎有下降的趋势。这导致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当城市居民群体中的高等教育机会性别差距日益缩小,并且女性还显示

出某种竞争优势的时候,农村人的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差距则在拉大。有关这一问题,作者将在以后做进一步的分析。

(三) 此项研究的政策意义

自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多出人才(教育规模扩张)和选拔出好的人才(通过严格的逐级考试制度和日益系统化、高难度的教学内容),教育公平问题没有受到足够重视。近10年来,社会公众对于某些领域的教育不平等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多——尤其是针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农村教育问题和高考选拔制度,政府也开始关注教育公平问题。2009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教育工作时把“促进教育公平”放在了首位。这显示出,政府决策者对于教育公平问题的高度关注,同时也显示了教育改革走向的新方向。本文开头时提及的温家宝总理的署名文章,也显示出决策者对此问题的关注度。然而,在政府不断增加教育投入尤其增加了农村教育投入的同时,在高等教育规模高速扩张的同时,我们却发现,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少年、弱势群体和较低社会阶层人士自动放弃继续求学机会而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一方面加剧了教育机会不平等进而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另一方面也制造了大量低技能的新生劳动力。如何降低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大学扩招是否能减少教育不平等?本文的研究结论很清楚:单纯依靠教育规模扩张并不能降低教育不平等,相反教育不平等还可能上升。教育扩张的同时还需要其他一些配套政策,才有可能降低教育不平等。关键性的问题是,在目前情况下,什么样的配套政策有利于减少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特别是城乡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近年来,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政策——包括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减少农民的教育负担、减免学费、推进农村的义务教育、增加对贫困大学生的经济资助,等等。但是,从本文的数据分析结果来看,这些政策对于缩小高等教育机会的城乡差距作用不明显,高等教育机会的城乡差距还在继续扩大。这就需要对上述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作进一步的思考。教育决策的理性选择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启示,如何提高农村居民、下层民众和弱势群体的教育收益、降低他们的教育成本和失败的风险,应该是相关政策设计的基本思路。

参考文献:

- 安树芬 2002,《中国女性高等教育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李春玲 2003,《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2005,《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趋势的实证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刘精明 2006,《高等教育扩展与入学机会差异 1978 - 2003》,《社会》第3期。
- “全国中小学教育现状调查研究”课题组 2009,《中国城市高中生的家庭背景调查》,载于 21 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编、杨东平主编《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09)》(教育蓝皮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人民日报》2009,《今年高考报名人数减少 40 万》6 月 3 日 11 版。
- 谭敏、谢作栩 2009,《高校大规模扩招以来我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发展状况分析》,《高教探索》第 2 期。
- 文东茅 2005,《我国男性与女性高等教育机会、学业成绩及就业结果的比较分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第 5 期。
- 温家宝 2009,《赞同教育资金来源多样化》,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n/>) 2009 年 1 月 4 日。
- 谢作栩、王伟宜 2005,《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研究——从科类、专业角度谈起》,《大学教育科学》第 4 期。
- 2006,《高等教育大众化视野下我国社会各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研究》,《教育学报》第 2 期。
- 谢作栩、王蔚虹、陈小伟 2008,《我国女性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异研究》,《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6 期。
- 《新京报》2009,《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减 30 万》6 月 3 日 A08 版。
- 徐平 2006,《不同高校类型中农民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分析》,《高教探索》第 5 期。
- 杨东平 2006,《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杨旻 2009,《高等教育机会性别不平等的因素分析与对策思考》,《江苏社会科学》第 3 期。
- 原春琳 2007,《高校招生向中西部倾斜——2006 年大学新生农村娃多过城市生源》,《中国青年报》5 月 29 日。
- 中国新闻网 2009,《重庆万名高中生放弃高考调查:就业难成重要原因》4 月 19 日。
- 《中国统计年鉴》,1991 - 2008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 Ayalon, H. & Y. Shavit 2004, “Educational Reforms and Inequalities in Israel: The MMI Hypothesis Revisited.”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7.
- Ballarino, G. F. Bernardi, M. Requena & H. Schadee 2008, “Persistent Inequalities? Expansion of Education and Class Inequality in Italy and Spain.”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5.
- Becker, R. 2003, “Educational Expansion and Persistent Inequalities of Education: Using Subjective Expected Utility Theory to Explain Increasing Participation Rates in Upper Secondary School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1).
- Breen, R. & J. Goldthorpe 1997, “Explaining Educational Differentials: Towards a Formal Ration-

- al Action Theory. ”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9.
- Breen, R. & J. O. Jonsson 2000, “Analyzing Educational Careers: A Multinomial Transition Model.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5(5).
- 2005,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Recent Research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Social Mobility. ”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1.
- Breen, R. , R. Luijckx , W. Muller & R. Pollack 2005, “Non-Persistent Inequality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Evidence from Eight European Countries. ”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SA-RC28 meeting , UCLA , Los Angeles.
- Breen, R. & M. Yaish 2006, “Testing the Breen-Goldthorpe Model of Educational Decision Making. ” In S. L. Morgan , D. B. Grusky & G. S. Fields (eds.) , *Mobility and Inequal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 Graaf, N. D. , P. M. de Graaf & G. Kraaykamp 2000, “Parental Cultur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Netherlands: A Refinement of the Cultural Capital Perspective. ”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3.
- De Graaf, P. M. & H. B. G. Ganzeboom 1993, “Family Background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Netherlands for the 1891 – 1960 Birth Cohorts. ” in Y. Shavit & Hans-Peter Blossfeld (eds.) *Persistent Inequality*. Boulder , Colo. : Westview.
- Erikson, R. & J. O. Jonsson 1996a, “Explaining Class Inequality in Education: The Swedish Test Case. ” In R. Erikson & J. O. Jonsson (eds.) , *Can Education be Equalized? The Swedish Cas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oulder: Westview.
- 1996b, “The Swedish Context: Educational Reform and Long-term Change in Educational Inequality. ” In R. Erikson & J. O. Jonsson (eds.) , *Can Education be Equalized? The Swedish Cas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oulder: Westview.
- Guo, M. 2008, “ School Expansion and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 1981 – 2006. ” Paper presented in Neuchatel (Switzerland) Meeting of ISA-RC02 of 2008.
- Jonsson, J. O. , C. Mills & W. Muller 1996, “A Half Century of Increasing Educational Openness? Social Class , Gender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Sweden , Germany and Britain. ” In R. Erikson & J. O. Jonsson (eds.) , *Can Education be Equalized? The Swedish Cas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oulder: Westview.
- Jonsson, J. O. & R. Erikson 2000, “Understanding Educational Inequality: The Swedish Experience. ” *L' Année sociologique* 50 , 2.
- Lindbekk, T. 1998, “The Education Backlash Eypothesis: The Norwegian Experience 1960 – 92. ” *Acta Sociologica* 41.
- Lucas, S. R. 2001, “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ducation Transitions , Track Mobility , and Social Background Effects. ”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6).
- Mare, R. D. 1980, “Social Background and School Continuation Decisions.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75(370).
- 1981, “ Change and Stability in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6.
- Pakulski, J. & M. Water , 1996 , *The Death of Clas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 Pfeffer ,F. T. 2008, “Persistent Inequality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its Institutional Context. ”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4(5).
- Raftery ,A. E. & M. Hout 1993, “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xpansion , Reform and Opportunity in Irish Education 1921 – 1975. ”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6.
- Shavit ,Y. & Hans-Peter Blossfeld (eds.) 1993 ,*Persistent Inequality. Changing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irteen Countrie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Shavit ,Y. & V. Kraus 1990, “Educational Transitions in Israel: A Test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Credentialism Hypotheses. ”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3(2).
- Shavit ,Y. & K. Westerbeeck 1998, “Education Stratification in Italy: Reforms ,Expansion , and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14(1).
- Shavit ,Y. ,E. B. Haim & H. Ayalon 2009, “Expansion and In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A Comparative Study. ” Paper presented in the Beijing Meeting of ISA – RC28 of 2009.
- Sieben ,I. & P. M. de Graaf 2003, “The Total Impact of the Family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 *European Sociology* 5.
- Sieben ,I. ,J. Huinink & P. M. de Graaf 2001, “Family Background and Sibling Resemblance in Education Attainment: Trends in the Former FRG , the Former GDR , and the Netherlands. ”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17.
- Smith ,H. L. & P. L. Cheung 1986, “Trends in the Effects of Family Background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Philippines.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 Stocke ,V. 2007, “Explaining Educational Decision and Effects of Families’ Social Class Position: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Breen-Goldthorpe Model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3.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谭 深

Strive for Autonomy: An institutionalism analytic framework about the rise and fall of rural collective enterprises *Xiong Wansheng* 48

Abstract: Based on review of the 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 theor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collective enterprises, this article proposes an alternative institutionalism analytic framework to interpret the rise and fall of rural collective enterprises. Different from the interpretation which has often been generalized as “competition for growth”, this new framework highlights the grass roots governments’ effort for maintaining and expanding the poor and valuable political autonomy in the extra large scale centralized system. This paper argues it is just the strife for autonomy that has propelled the collective enterprises to develop endogenously from the grass roots society. The grass roots governments’ failure ended the collective enterprises’ prosperity.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Inequality in Opportunity of Education: A study on effect of “Kuo Zhao” policy on equalization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Li Chunling* 82

Abstract: There is a debate about education expansion’s impact on inequality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During 1999 – 2002,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dopted a policy to increase enrol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This resulted in a five-fold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expansion of opportunity for higher education doubled in five years. The paper, based on sub-data drawing from 1% population sample survey data of 2005 and using logit models, examines the impact of higher educational expansion during this period on inequalities of classes, “Hukou” status, ethnic and gender in China. The author tests the validity of the MMI hypothesis, EMI hypothesis and RCT theory in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equalities of higher education among classes, ethnic groups and sexes have not declined during the sharp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but ine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between people born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as increased during this period.

Charity, Gospel and Nationalism in the Public Sphere: The leprosy relief in modern Hangzhou *Zhou Donghua* 114

Abstract: The disease’s relationship with social-culture, especially with colonialism and nationalism is catching more and more concern in the academia.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missionary medical and Chinese social-culture by telling the story of the leprosy relief in modern Hangzhou. Missionary medical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leprosy relief of the Modern China. By building shelters,